

国际关系学与外交史研究的借鉴与融合

——从约翰·加迪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谈起

卢凌宇 沙子舒

内容提要 史学的基本学术功能包括描述、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学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能够辅助外交史研究,取决于国际关系学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升外交史的学术功能。美国冷战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积极地在历史研究中应用国际关系理论。由于肯尼思·尼尔·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未能预测到冷战和平终结,加迪斯严重质疑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功能,转而批判国际关系理论,提倡使用单一的历史研究方法从事外交史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并非不具备预测功能。加迪斯误解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功能,把解释性的理论用来做预测,并因此质疑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且,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性等原因,国际关系理论进行预测只可能是概率性的。事实上,只要遵守理论借鉴的“功能匹配”原则,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外交史研究的犀利工具。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约翰·加迪斯 国际关系学 外交史 预测 功能匹配

* 卢凌宇: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邮编:650091);沙子舒: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邮编:650091)

** 本文是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非合法性暴力对发达国家能力的影响研究”的研究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研究》的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中肯且富于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章的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是冷战史研究名家,被《纽约时报》誉为该领域的“泰斗”,曾先后出版了《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长和平:探究冷战史》《美国与冷战的结束:意义、反思与挑战》和《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史》等著作,^①分别代表了他在不同时期对冷战的思考。20世纪70年代,加迪斯主要采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复杂的、多维度的历史叙事来展现冷战发生和演化的历史进程。在该阶段的代表作《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中,加迪斯运用美国新解密的大量官方档案对1941—1947年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进行分析,^②行文简洁明快,描述为主解释为辅,把是非判断和因果分析等留给读者,体现了加迪斯早期对冷战史的思考。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肯尼思·尼尔·华尔兹(Kenneth Neal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日益受到关注。在华尔兹的启发下,加迪斯开始尝试纠正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的“理论贫乏”和视角单一的不足,着手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冷战史。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和《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他提倡以国际关系理论来指导跨学科的外交史研究,在冷战史研究中大胆地应用华尔兹的理论,从安全和国际体系的角度来解释冷战的起源等问题,^③同时从战略的视角对遏制战略进行综合评价,探讨冷战期间大国稳定关系的形成机制以及核武器所起的作用等。^④加迪斯这个阶段的工作掀起了“后修正主义”冷战史研究的高潮。

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和平终结给政学两界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几乎整个学界都没有预测到冷战的和平终结,哪怕是这个过程当中的某一个方面。^⑤加迪斯深入地反思了此次预测的失败,研究了国际关系理论的限度以及历史

^① 参见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美〕约翰·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mplications, Reconsiderations, Provoc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②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6-72.

^③ 〔美〕约翰·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第179—183页。

^④ 〔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6页。

^⑤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 No.3, Winter 1992-1993, p. 18.

研究方法面对的困难和前途。以1992年《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的终结》一文的发表为标志,加迪斯实现了从借鉴国际关系理论来辅助外交史研究到高度重视史学研究方法尤其是新文化史的又一次转变。^①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赫斯特(Steven Hurst)认为,加迪斯早期的著作体现了明显的“新现实主义”色彩,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则回归到美国冷战史研究的“正统”。^②加迪斯强调,相较于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学方法在描述和解释国际关系和外交史上更具优势,并且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要优于社会科学。^③作为一位在冷战史和外交史研究领域声名卓著的学者,加迪斯的这个转变不仅反映了冷战史和外交史研究方法的变化历程,而且扩大了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史研究业已存在的鸿沟。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加迪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无助于外交/国际关系史研究。实际上,加迪斯对结构现实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是理论“功能错配”的结果:他将原本适用于解释的国际关系理论用于预测。换言之,只要功能匹配恰当,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外交史研究的犀利工具。不仅如此,加迪斯还误解了国际关系理论预测的性质,对于具备预测功能的国际关系学做了不切实际的期待,掉进了“历史决定论”的陷阱。

本文正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地探讨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外交史的关系。第二部分概述国际关系学对外交史研究的作用。第三部分是全文的重点。本文借鉴德国曼海姆大学政治学教授托马斯·克施文德(Thomas Gschwen)和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欧洲政治教授弗兰克·席美尔芬尼(Frank Schimmelfennig)提出的类型学标准,从研究设计的角度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外交史研究借鉴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进行功能匹配,不能用解释性国际关系理论来进行预测。此外,国际关系的预测性理论都是概率性理论,无法确保预测成功。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①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p. 5-58.

② Steven Hurst, *Cold War US Foreign Policy: Key Perspectiv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68-71.

③ 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Theory, and Common Grou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1, 1997, pp. 75-85.

一、历史学、国际关系学与历史学的功能

历史是有记录的文字所描述过去。^① 历史学则通过叙事来探讨和分析过去的事件,或者客观地判断过去事件的因果模式。^② 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子学科,外交史致力于探讨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官方交往的历史。^③ 外交与国际关系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国际关系是以国家为主的国际政治行为体间的互动,外交则侧重国际关系中的官方交往。^④ 从学科属性来看,历史学是所谓人文学科(humanities)的主干学科之一,国际关系学则是一门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⑤ 社会科学也被称为“软科学”,区别于以物理学和化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或“硬科学”,两者共同构成“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显著差别。就认识论而言,自然科学旨在发现一般规律,为此总是致力于“抽象化”和“普遍化”,从个别现象中归纳出规律,把特殊规律提升为一般规律。人文科学则倾向于把研究对象“具体化”或“个别化”,强调个体的特殊性。^⑥

尽管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学存在明显的学科定位差异,但是,外交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都倾向于强调两者相互借重。在他们看来,两者相互借鉴的前提是它们存在共性或者紧密的内在联系。加迪斯认为,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关注人类社会现象,而不是实验室里发生的反应,因此都属于“不可复制”的科学范畴。^⑦ 也有学者认为,两者的共性在于“实现解释这一

① George Santayana, *The Life of Reason or, The Phases of Human Progres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8, p. 82.

② Richard Evans, “The Two Faces of E. H. Carr,” *History in Focus, Issue 2: What Is History?*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8, <https://archives.history.ac.uk/history-in-focus/Whatishistory/evans10.html>, 2020-03-08; Alun Munslow, “What History Is,” *History in Focus, Issue 2: What Is History?*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8, <https://archives.history.ac.uk/history-in-focus/Whatishistory/munslow6.html>, 2020-03-08.

③ Saho Matusumoto, “Diplomatic History,” in Kelly Boyd, ed., *The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Taylor & Francis, p. 314.

④ Paul Wilkins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2; 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5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4; Richard Devetak,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7.

⑤ 汪信砚:《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光明日报》2009年6月16日,第11版。

⑥ 汪信砚:《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Colin Elman and Fendius Elman, *Bridge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1。

⑦ 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Theory, and Common Ground,” pp. 75-85.

研究目的”，它们“在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这一根本步骤上，是完全一致的”。^①

本文认为，从操作角度看，国际关系学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辅助外交史研究，取决于国际关系学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升外交史的学术功能。广而言之，历史的功能主要有两类：一是个体功能，比如明智、蓄德；二是社会功能，包括政治功能和学术功能，其中政治功能主要指教育（比如为执政党服务）、资政。^② 在历史的社会功能这个范畴里，如果说政治功能的重点是“致用”，那么“求真”则既是历史发挥学术功能的前提，也是学术功能最重要的内涵。^③

历史的传统学术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描述（description），二是解释（explanation），其中描述是解释的基础，也是传统上历史学最重要的功能，解释则是描述的延伸和升级。19世纪的史学家往往把历史定位于解释而非描述，重点关注社会的结构、政府形态的演化和国家间的关系。他们宣称历史学家有三重任务：一是收集和调查事实，研究事实间相互联系的方式；二是发现社会的组织、生命周期及主导历史进程的法则；三是重视一个个历史事实的生动面貌，展示它们的个体形态和特质。实际上，发现法则和展示特质都是解释的范畴，但它们的基础则是“收集和调查事实”，则是描述的主要内容。

在目前西方史学的三个主要范式中，兰克史学、年鉴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范式对于史学功能各有侧重。兰克史学强调“如实直说”，运用原始材料对历史事件做出描述，高度重视史学的叙述功能。年鉴学派强调跨学科的长时段研究，鼓励使用计量方法来解释历史。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历史学家不仅要陈述历史发展的规律，还要总结历史规律并做出解释。^④ 加迪斯在《遏制战略》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历史学家被分为两类，分别是“聚合者”与“分割者”。“聚合者”重视解释历史，“用一种有序的模式避开历史的混乱无序”“将秩序加诸于往昔”，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分割者”则专注于描述特定的历史事件，“他们喜欢指出例外、保留、难以协调的矛盾”。^⑤

预测（prediction）并不被视为历史学的传统目的或功能。^⑥ 不过，古往今

①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specting Difference and Crossing Boundar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1, 1997, pp. 8-11.

② 刘志琴：《当代史学功能和热点的转向》，《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83—86页。

③ 尤学工：《论史学价值和历史教育》，《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17—30页。

④ 李隆国：《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6页。

⑤ 〔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导言，第5页。

⑥ “预测”主要由两个英语词来表达：一是“prediction”，二是“forecasting”。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既包括对未来的预见，又指对于已发生但尚未知事件的推测，而后者则只具备前一个意义。本文中按照惯例，统一使用“prediction”这个词，但在内涵上主要指针对未来的推测。

来,不乏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预测功用。比如,修昔底德曾言:“过去发生的事件将要在未来的某个的时刻以大致相同的方式重复出现。”^①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对预测更为重视。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历史学教授爱德华·英格拉姆(Edward Ingram)指出,时间是历史的主轴,历史学家站在现在的时间节点上向前看也向后看,虽然回顾过去更常见。^②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戈登·克里格(Gordon Craig)大量地借鉴了理论家的工作,提倡历史学家寻找各种案例之间的关联性并由此进行历史预测:“在相似性的基础上,把独特的个案视为某一族或某一类现象的成员,然后通过合理的分析方法,发现不同变量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可能具有因果性,至少也可以作为具有预测价值的指标使用。”^③

二、国际关系学如何助益外交史研究?

从知识形态和存量的角度来看,国际关系学主要是国际关系理论,这个导向在美国体现得尤其明显。有外交史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提出尖锐的批评,如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索恩(Christopher Thorne)认为,国际关系学的高级抽象概念是“超理性的演习”“与历史事实提供的复杂性脱节”“进入了准神学的高级阶段”,并“使用一种不可爱的语言进行表达”。^④他认为,历史研究比理论构建厚重,“理论是灰色的而叙事的生命之树常青”。^⑤尽管如此,大多数外交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值得借鉴。

在我国,一些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⑥例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小明认为,在对冷战性质的分析中,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能从两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来解释(如马克思主义),也能从比意识形态

①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Rex Warner, Baltimore, MD: Penguin Classics, 1972, p. 48.

② Edward Ingram, “The Wonderland of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1, 1997, p. 57.

③ Gordon A. Craig, “The Historia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8, 1983, p. 9.

④ Thomas W. Smith,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7-56.

⑤ Ibid., p. 188.

⑥ 任东来:《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第19—21页;张曙光:《冷战国际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构建中国国际关系体系的研究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第9—16页;王立新:《跨学科方法与冷战史研究》,《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第27—38页;崔建树:《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4—144页。

概念更为宽泛的观念和文化的角度解释(如建构主义)。既然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冷战性质的解读各不相同,那么就并不存在一个包罗万象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结合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对问题进行分析,才会对冷战的性质有比较全面的把握。^①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桂银指出,国际关系局部理论对当代史研究特别是现状研究或案例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这是由局部理论本身的性质和特征所决定的。局部理论即微观理论主要指对国际关系事件和对外政策的某些特定方面进行实证分析,注重精准描述与解释,运用科学的定性或定量方法来验证假设,是具有更好的预测能力的理论,而具备这些性质和特征的理论对总体理论即宏观理论做出了补充,使得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议题和方法等都大大扩展,如决策理论、危机管理理论以及博弈论,它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的适切性都不言而喻。^②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在《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一文中提到,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局限性遮蔽了试图做出预测的学者的视野,“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的差异进行界定”,结果则是损害了知识的完整性,并且提出了历史学可以在多个方面弥补国际关系学之不足,提升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质量。^③

本文认为,在既定的学科差异之下,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是相互促进的。国际关系理论能够显著地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当我们谈到历史学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借鉴时,我们主要指国际关系理论辅助历史学更好地实现它的三个学术功能:

(一) 描述历史事件和过程

国际关系理论能辅助史学更好地发挥描述功能,使陈旧的历史材料展现出新颖的描述视角。国际关系理论会让历史的叙述和分析更加紧凑,让对繁杂的历史事件的描述呈现出规律与模式。

描述的主要内容是系统地收集事实,主要来源是档案和历史事实汇总。描述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历史学家发现历史规则和进行历史解释都是在描述

① 张小明:《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第17—19页。

② 周桂银:《国际关系局部理论与当代史案例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第14—17页。

③ 王立新:《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兼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与互补》,《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第27—38页。

过程中实现的。^①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科学教授加里·金(Gary King)等把描述和解释视为社会科学两个相互依赖、互相强化的目标。“没有好的描述,我们无法建构有意义的因果解释;反过来说,描述如果不和因果关系相联系,就会失去大部分意义。”^②重视史料的历史学家往往只关注一手资料的收集与积累,对抽象程度较高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感兴趣,其史学研究成果表现出支离破碎与模棱两可的特点。意大利哲学家贝尼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指出,简单的编年史只不过是历史的废物、腐败的尸体,在理论的指导下,历史才具有前进的方向,历史事实的叙述会呈现出规律与模式。^③ 历史描述本身是庞杂的,但由于理论发挥的梳理作用,历史的脉络并不是杂乱无序的,历史研究也不是单纯的事实排列与历史事实的积累。

按照科学的标准,好的历史并不等同于对历史事件做出完整描述,而是对历史进行恰当的理论分析。理论化程度越高,理论模型越清晰,历史分析才会越有说服力。^④ 所以,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研究时不仅要详细地叙述,也要借助理论做出连贯的描述。历史学家要处理的历史证据复杂且多样,有必要借助“类似于身体骨骼的理论,赋予身体(史实)以形状和功能”。^⑤ 理论的模式、概念与叙述就是历史叙事的“骨骼”。借助它们,历史学家得以理解历史事实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历史进程的连续性,让历史叙述描述和分析更加紧凑,把历史经验上升为理论。^⑥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和政治学荣休教授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指出,历史学家通常关注偶然性、复杂性和因果异质性,较少反对事件发生顺序(sequence)的重要性或者认为事件发生的背景无关紧要。事实上,事件和过程不断以多种多样的、重叠的方式互动:这样的互动模式并不是持续偶然发生的,更确切地说,规律会在特定的环境背景下出现,构成不同地点下的集合,形成社会结构的边缘和边界。也就是说,这些相对固定的互动模式会被复制,转

① 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Theory, and Common Ground," pp. 75-85.

② Gary King, et al.,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13.

③ Thomas W. Smith,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87.

④ Jack S. Levy, "Too Important to Leave to the Other: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1, 1997, pp. 32-33.

⑤ [美]肯尼思·汤普森:《国际政治理论的形成》,林伟成等译,载[美]斯坦利·霍夫曼选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⑥ 秦治来:《探寻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传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化为社会事实(或称其为具有连贯性的实体)。有学者称这样的实体是历史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接触语言(contact language)。可以认为,“历史本体论”的研究就建立在对这些实体的出现、延续和扩散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实体也可以被理解为概念、制度或理论。^①

此外,国际关系学中的概念有助于外交史学家精准地定位和描述历史现象,美国杨百翰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肯德尔·斯泰尔斯(Kendall Stiles)认为,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融合具有很大潜力,概念源于对历史的审视,而历史只有通过概念才能获得理解。^②

(二) 解释和普遍化历史

国际关系理论能够显著地改善史学的解释功能。它弥补了外交史学中理论和方法的不足,帮助外交史学家发现历史事件的模式,而不是只着眼于一些独特的事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藉此促进外交史的理解与描述。

按照德国哲学家卡尔·亨培尔(Carl Hempel)广为接受的定义,解释就是“表明一件事是更具普遍性的一类事件的一员。”^③这个定义也被称为“覆盖律”或“演绎—法理模型”(deductive-nomological model),其中普遍化被视为是解释的前提,简言之,就是用抽象程度更高的概念来说明抽象程度较低的概念。

历史学家是理论的消费者,国际关系理论家则是理论的生产者,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能够为外交史研究提供理论基础,补充概念性和一般性知识。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杰克·列维(Jack Levy)认为,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利用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假设、模型等理论工具来辅助外交史的研究。所有的经验观察都是通过先验的心理框架过滤的,解释必须建立在潜在的理论假设和概念的基础上,而这也是外交史研究所欠缺的,他们只是构建基于叙述的解释而不是基于理论的而解释,而国际关系可以利用概念、分析和假设、模型等来对外交史进行解释和概括,从而推动外交史的研究。^④

① George Lawson, “The Eternal Divide?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7, No.3, 2012, p. 217.

② [美]斯泰尔斯:《国际政治案例史》,王郁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③ Gabriel Almond and Stephen Genco, “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29, No.4, 1977, pp. 499-500.

④ Jack S. Levy, “Too Important to Leave to the Other: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1, April 1997, pp. 22-23.

在美国雪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埃曼夫妇(Colin Elman and Miriam Elman)看来,历史学家在考虑问题时往往忽略结构、因果、变量与战略互动等因素,但国际关系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些不足。“单靠理论或者历史是不足以解释问题的,那些主张通过叙述事实来理解问题的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选择事实的时候所遵循或隐藏的原则。政治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鼓励和沉迷于抽象概念的迷津之中,把自己头脑中的构想当作现实,我们只有往返于历史和理论之间才能避免这样的错误”。^①

历史是理论的主要来源,理论则是历史的深化和简化。没有理论的历史是盲目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通过建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的“思想图景”(thought pictures)来实现“理想类型化”(Idea-typification),并以之作为检验经验现实的启发式工具,“理想类型化”并不意味着复制历史,而是作为历史现实的简化地图,以帮助研究人员追踪和描述典型因素的配置如何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特定的历史结果,以说明具体的因果关系。换言之,理想类型化并不代表“真实的历史”,而是旨在简化历史,目标是揭示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又是“可移植的知识”。理想类型化突出了历史事件和过程的关键特征,并反过来检验这些关键特征在其他时间点的显著性,理想类型化是以事件为开端的偶然性概括的发展,这种概括为理解某些同类型事件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依赖,成为历史与社会科学连接的一个活跃点。^②这种形式的具体研究例子很多,比如,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因(Michael Mann)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全面描述,或者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对现代国家体系全球起源的探索,^③这些研究在关注历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的同时也兑现了社会科学对“旨在产生事实知识的系统研究”的承诺。

(三) 预测历史的走向

即使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功能只是概率性的,历史学也会因此受益。埃曼夫妇在他们的前引文中指出,历史学家在许多方面和政治科学家不同。历史学

^①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specting Difference and Crossing Boundaries,” pp. 20-22.

^② George Lawson, “The Eternal Divide?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7, No.3, 2012, pp. 219-220.

^③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John Hobso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家的解释基于叙述,而非理论。历史学家聚焦于过去,对当前关注较少,也较少做预测。^① 加迪斯认为,历史的潜能在于通过理解过去为认识未来提供启示,这种启示更多地建立在类比的基础上,通过想象、感觉、有时候是推理来想像未来。虽然历史研究没有明确地说要达到什么目的,但它的预测能力比理论更强。^② 在进行历史叙述时,历史经验所蕴含的因果关系和规律是不能够被忽略的。不过,如果只是做事件陈述,而不从中寻找决定性的解释变量,就无法提取一般性结论以建立合理的因果推论。所以,盲目地认为历史学家能够做预测也是错误的。相比之下,从事件陈述中抽象出决定性的自变量显然是国际关系学的专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都是思想史,每个人对历史都有自己的解读。对历史的每次个体化解读都是一次自我创新的过程。由于个体化的差异导致每次解读都不相同,研究内容因此也就无法复制,也难以传播。既然历史的预测功能很有限,我们可以转而依赖更加简洁和程式化的国际关系理论。有学者认为,理论是一个模型、一个路线图或者一个透镜,理论的作用是理解历史。理论应该优雅而简洁,旨在阐明国际政治的总体趋势或结构,然而,理论也不是歪曲历史或捏造因果关系的许可证。它是理解的工具,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的信条。^③ 我们只有通过合理地利用理论才能增强历史学的预测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关系学不仅有助于实现历史学的学术功能,在方法和技术上也能对历史研究形成有益的启发。国际关系学的方法不断发展,吸纳了各学科的方法,为外交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模式,拓展了外交史学家的视野,使得他们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教授史蒂芬·哈伯(Stephen Haber)认为,外交史学家可以借鉴国际关系理论家使用的分析技术(如基于数据或数学模型的综合研究),并学会科学检验他们的猜想。^④

三、国际关系理论的类型学

加迪斯认为,外交史学家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消费者。作为消费者,外交史学家有必要根据自己的需要,从货架上挑选合适而非心仪的产品。^⑤ 本文认

①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specting Difference and Crossing Boundaries," pp. 11-15.

② 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Theory, and Common Ground," pp. 78-81.

③ Edward Ingram, "The Wonderland of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pp. 53-63.

④ Stephen Haber, et al., "Brothers under the Ski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7, Vol.22, No.1, pp. 34-43.

⑤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p. 5-58.

为,外交史学家选择国际关系理论产品的标准并不是史学家的个人偏好,而是理论产品本身的类型:只有当历史研究的目的与理论的功能相匹配时,理论才能为历史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加迪斯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指责和由此产生的研究转向,实际上是理论功能错配的结果,是“关公战秦琼”。

社会科学理论分为规范理论和经验理论两个类型,其中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回答“应然”的问题,面向未来,可能受到历史的启发,但没有经验支持;经验理论(empirical theory)则是关于“实然”的系统陈述,无论采取演绎还是归纳的理论建构方式,本质上都是对历史事实的概括和归纳。我们通常把规范理论划归政治哲学的范畴,所以,国际关系理论也就是经验国际关系理论的代名词。

常规经验研究的主干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理论建构,二是经验检验。经验检验是对研究设计的执行。研究设计则是“指导搜集、分析和阐释数据的过程的方案。”^① 克施文德和席美尔芬尼根据经验检验中样本观察数和因果推理的类型,把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分为四种类型(参见下表):^②

表 国际关系学因果推理的类型

		因果推理类型	
		因素导向	结果导向
观察数	大样本	第二象限 统计(回归)分析 例子:奥尼尔和拉塞特(2000年)	第一象限 定性比较分析 例子:柯尼希—阿奇布贾(2004年)
	小样本	第三象限 比较个案研究 例子:斯摩克(1977年)	第四象限 单一个案研究 例子:埃利森(1969年)

资料来源:Thomas Gschwend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eds., *Research Design in Political Science: How to Practice What They Preac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14.

上表的观察数指的是样本规模,简言之,就是支持理论的经验数据的数量。根据因果关系的类型,研究设计可以分为因素导向(factor centric)和结果导向(outcome centric)。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探索因果关系的必要条件,后者则寻找充分条件。因素导向研究设计忽略过程或者把过程视为一个黑匣子,只考察在控制阶段前后,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大小和方向,自变量通常只有一个。相比之下,结果导向的设计则通不同的自变量组合来对因变量做出充分的解释。

^① Richard Rich, et al. *Empirical Political Analysi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9th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 49.

^② Thomas Gschwend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eds., *Research Design in Political Science: How to Practice What They Preac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14.

更重要的是,上述四种类型的理论履行不同功能。具体而言,因素导向研究设计支持的理论只能用于解释(第二、三象限);结果导向研究设计和大样本支持的理论可以用于预测(第一象限),而结果导向设计和小样本支持的理论很接近描述性理论(第四象限)。

因素导向的研究设计旨在测试单一或少数自变量对因变量施加影响的统计显著性、方向和强度。这样的研究追求理论的外部有效性,即研究结论(理论)能够解释尽可能多的同类现象。象限二的代表是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政治家约翰·奥尼尔(John Oneal)和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拉塞特(Bruce Russett)对康德“三角和平论”的系统阐发和检验。康德将国际贸易、“民主”制度和国际组织视为实现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因素。^①两位作者把三个因素对世界和平的影响做了系统的论证,并使用1885—1992年6000个国家的大样本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支持了康德的假说。象限三的理论可以以布朗大学已故外交政策发展中心主任斯摩克(Richard Smoke)对冲突升级的探讨为例。^②斯摩克认为“概念失败”(conceptual failure)是导致冲突升级的重要原因。所谓概念失败,指的是决策者错误地理解了决策的历史背景,未能认识到决策的后果不是一个事件而一系列事件,尤其低估了对手对于未来的期待与自身期待的差异。同时,概念失败又是一系列认识因素作用的结果,比如面对模糊性和复杂性时决策者的认和一贯性偏好(cognitive consistency)。斯摩克的研究方法是结构化、聚焦比较分析,包括正反五个案例:西班牙内战、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七年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结构现实主义”“新制度自由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这样的体系理论通常属于因素导向理论的范畴,^③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体系理论往往强调单一因素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比如,上述三个理论的贡献分别在于论证了物质(军事力量)分配、制度分配和文化分配对国家间(大国)关系的影响;二是虽然这些理论的建构者未必提供了系统的定量或定性经验检验,但它

① John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② Richard Smoke, *War: Controlling Esca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③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Addison-Wesley, 1979;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们要么符合人们的直觉或常识,要么得到后续经验研究的支持。比如,一方面,冷战被视为“结构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经验基础;另一方面,华尔兹的理论开创了新现实主义的研究纲领,得到了后续现实主义者的检验和补充。^①

结果导向的理论分布在第一和第四象限,两者在形式上的差异是经验支持的多少。第四象限是单一个案研究,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针对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决策提出的理性决策、组织过程和官僚政治模式。^②虽然艾利森旨在解释,但由于只有单一个案作为经验支持,所以,这类文本中的解释类似于一对一的描述。尽管如此,艾利森的解释充分地体现了国际关系学解释与历史学解释的区别。国际关系学者追求一般性与理论性解释,而历史学家则注重叙述性解释和阐释,重视事件叙述的精确性和完整性,寻求特殊事件的特殊解释。^③第一象限的理论以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为经验基础。从形式上看,定性比较分析和单一个案研究都旨在寻找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两者的区别在于样本规模的大小:前者要求至少14个观察数(案例),后者则只有一个观察数(案例)。定性比较分析以集合论和布尔代数为数理基础,承认现实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着重探索社会现象的多重或并发条件的一种分析方法。定性比较分析并不将各影响因素视为独立作用于因变量的自变量,而是将其视为以组合方式共同引致被解释结果的条件构型中不可与其他因素割裂的要素。这种方法并不关注个体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效应,而是专注于挖掘对被解释结果有解释力、由大量前因要素组成的相似或相异类型。^④换言之,定性比较分析寻找导致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马修斯·柯尼希—阿奇布贾(Mathias Koenig-Archibugi)运用定性比较分析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些欧盟成员国追求超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而另一些成员国则坚持主权至上原则。这个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作者把欧盟成员国对超国

① Patrick James, "Neorealism as a Research Enterprise: Toward Elaborated Structur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4, No.2, 1993, pp. 123-148.

② Graham Allison, "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3, No.3, 1969, pp. 689-718.

③ Colin Elman and Fendius Elman, *Bridge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1.

④ Charles Ragi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Charles Ragin, *Redesign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Chicago, I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8.

家主义(supernationalism)设置为因变量,根据1991—1996年的数据,发现了产生外交和安全领域超国家主义的两条路径:一是成员国的地区治理水平+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与其他成员国投票的趋同性;二是成员国的地区治理水平+公众对欧盟的认同程度+成员国综合实力。^①

在上述四种类型的理论中,只有第一象限的理论具备预测能力。在很多国际关系学者看来,预测是本学科的基本目标之一。^②国际关系学的预测记录一直差强人意,更重要的是对重大事件的预测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

从形式上讲,要增强一个模型的预测能力,就有必要在该模型中添加尽可能多的变量。变量添加不是随意的,每一个变量都代表着对一种理论的认同。例如,我们在预测国家能力时,常规的控制变量包括国际冲突、内战、联邦制、政权类型、族群政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外来援助、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等诸多因素。这些变量往往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研究中被反复确证会显著地影响结果变量。唯有添加尽可能多的变量,才能最大化预测成功的概率。变量添加的过程,也是将探索必要条件的理论转化为寻找充分条件的理论的过程,理论从因素导向转化成了结果导向。

这个转变是有代价的,首先是牺牲了理论的简约性,导致模型的内涵越来越丰富,结果让模型丧失了作为理论的价值。不仅如此,预测还可能摧毁理论本身。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布宜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等指出,逻辑上的一致性理论成立的首要前提。^③逻辑不能自洽的理论无法证伪,这不仅让理论的内涵复杂化,而且使得理论丧失了其经验属性。例如,在20世纪70—80年代,朝鲜的军事能力相对韩国下降很显著,对韩国形成的威胁急剧下降,维持美韩联盟的必要性因此显著降低。尽管如此,美韩联盟并没有解体或削弱,原因有三点:(1)韩国为了维持内部团结和国家身份,不能过度改善和美国的关系;(2)韩国必须无条件地在军事上依附于美国,才能在与朝鲜发生冲突时得到美国的有效保护;(3)美国的是西方世界的盟主。这个身份使得美国必须履行保护盟友的职责,对朝鲜可能对韩国形成的军事和安全

① Mathia Koenig Archibugi, "Explaining Government Preferences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EU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8, No.1, 2004, pp. 137-174.

② [美]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210页。

③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James Morrow, "Sorting through the Wealth of No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2, 1999, pp. 56-73.

威胁给予充分的威慑。^①此外,美韩联盟已经运行了30—40年,制度已经成熟,联盟的维持成本远低于建立成本,也是韩美联盟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上述四点至少涉及现实主义(军事实力)、建构主义(国际身份)和自由主义(制度运行成本)三种理论。显然,上述对于美韩联盟延续的解释是比较充分的,它杂糅了假定很不相同的至少三种理论,由于三者的基本假定各不相同甚至冲突,所以理论本身自相矛盾,很难证伪。不仅如此,这样的理论即使预测正确,我们也很难辨别到底是哪个自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最大,以及不同自变量的相对影响各有多大。对于单一历史事件而言,情况尤其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曾一度是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史的热门问题。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们贡献了诸多解释。但是,由于历史既不可逆转,又不可复制,学者们的洞见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学术共同体达成的一个共识。我们可能永远无从确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②

综上所述,加迪斯对国际关系理论预测的批评是错位的。他的观点与埃曼夫妇等相同,认为历史擅长解释过去,国际关系应该预测未来。^③不过,加迪斯认识到历史的预测功能十分有限。他深刻地指出:“相较于数学与化学等‘硬科学’,历史的预测效用是十分有限的,在实验室条件下,相同数量和条件下的变量重复组合总是会产生相同的结果,而面对人类社会中不可复制的现象,历史则更多地依赖于想象。”^④他转而寄希望于国际关系理论做出精准的预测,因为预测被不少学者视为社会科学的目的之一。

实际上,即使加迪斯运用第一象限的理论来做预测,预测结果很可能仍然是失败,原因在于:国际关系预测都是概率性的,很难确保每次预测都正确。进一步说,国际关系预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成功,成功预测是小概率事件。预测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国际关系世界是人的世界的一部分,人的世界与物理世界是异质的。物理世界中存在的两个特点,即决定事物间关系的条件是稳定的与事物对条件作用的反应是稳定的,这两个

① Jae-Jung Suh, “Bound to Last? The U. S.-Korea Alliance and Analytic Eclecticism,” in Jae-Jung Suh, et al., eds.,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31-172.

② 卢凌宇:《预测与国际关系科学》,《欧洲研究》2014年第3期,第143—145页。

③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specting Difference and Crossing Boundaries,” pp. 11-15.

④ 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Theory, and Common Ground*,” pp. 75-85.

特点在人类世界中都不存在,人类行为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和易变形。所以,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在预测能力上存在巨大的差别,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能力是很有限的。^① 导致这个现实的原因还在于人的世界存在太多的偶然性和突发事件;国际关系学者所要观察到和处理的经验资料庞杂无序,所能接触到变量只是数量众多的因素的一小部分,并且很多变量不可控制。不仅如此,不完全信息和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进一步提高了预测的难度。加迪斯本人认识到,“没有谁比历史学家(或小说家)更能明白现实的复杂了,如此复杂以至于总结出一套可用的理论几乎成为不可能,偶然因素足以完全破坏之前建立的理论”。^②

不仅如此,国际关系学研究者本身具有主观能动性。撰写历史事件的历史学家即使谨遵兰克学派的学术规范,如实直言,也难免在材料的选择和辞藻的堆砌上渗透自己的观念和想法。一旦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渗入主观因素,规律本身就会被扭曲,历史事实本身的客观性也会遭到破坏。自然界的演变过程与人类基本无关,而人类历史的进程则和人类密切相关。主体本身参与了客体的发展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客观规律。^③

鉴于以上的原因,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学者必须懂得和永志不忘的第一个教训是,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使得简单的解决方案和可靠的预言成为不可能,正是在这一点上,学者和冒牌学者分道扬镳了”。^④ 华尔兹也明确地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是解释,而不是预测。^⑤ 在这些学者看来,精确预测的本质就是“历史决定论”:人类的状况亘古不变,历史是永久的先例,未来只需按照天意的设计来生活。^⑥ “历史决定论”在国际关系学中呈现为一个较弱的版本。学者们相信“过去传达了关于事务必然经历的未来路线的信息,”^⑦ 政治在本质上是模式化的,并且这种模式会在一定时期持续下去,而国际关系学的功能就

① 卢凌宇:《预测与国际关系科学》,第143—145页。

②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p. 56-57.

③ 秦治来:《探寻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传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页。

④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⑤ Kenneth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4, 1997, pp. 913-917.

⑥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150页。

⑦ Samuel Barkin, “Realism, Prediction,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5, No.3, 2009, pp. 243-246.

是发现这些模式。^① 加迪斯对此也有深刻的见解。他指出,预测是人的本能:人类无论是认识自然还是社会,都有天然地进行理论综合的倾向。人类的理论综合本能的目的在于得到一套可供遵循的方法、路径、视角。依靠这些方法、路径和视角,我们得以在下次遇到相同问题的时候少走弯路,提高认识客观对象的效率。尽管如此,现实的复杂性有可能会使得之前总结的判断无法完全有效指导之后的认识活动,这就容易导致理论的失效,这一情况成为任何理论都无法避免的两难困境。^② 加迪斯继而指出,历史是不可复制的科学。它并不假定知道过去就会揭示未来,而是提供方法,以应对将要到来的一切。历史学与其说要预测未来,不如说要为之做准备。^③ 可见,加迪斯对于历史学预测功能有着客观、清醒的认识。相比之下,他对国际关系理论预测的期待则是反科学、非理性的。

结 语

作为当代著名的外交史学家和冷战史权威,加迪斯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积极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辅助冷战史研究。但是,由于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未能预测到冷战和平终结,加迪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产生质疑,并做出“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在预测方面做得更好”的论断。国际关系是人的世界。在复杂的人类社会,我们无法像在物理世界那样做大规模的可控实验。作为一门“软科学”,国际关系难以做出准确的预测。所以,加迪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质疑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无助于历史研究,而是由于他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功能做出了不切实际的期待。

实际上,加迪斯也并未完全放弃国际关系理论,他只是彻底放弃了“结构现实主义”,转而借用强调文化和意识因素的“建构主义”。本文的分析表明,国际关系理论能够帮助史学更好地发挥描述、解释和预测的学术功能。缺乏理论的历史学研究是支离破碎的。两个学科应该在方法和技术上互相借鉴,促进彼此共同发展。不同类型的国际关系理论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同对理论的需求也不同,在选择国际关系理论来辅助历史学研究时应选择合适的理论,即根据不同功能需求匹配相应类型的国际关系理论,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外交史研究的进步。

① [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

② 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Theory, and Common Ground," pp. 78-81.

③ Ibid., p. 84.